

赵超构与旅居安庆的报人赵继纯

富晓春

(一)

1937年。南京。

新街口人来人往,小汽车、人力车川流不息,报童撕开嗓门的叫卖声不绝于耳,从朝报社与新民报社大门口各自走出一个年轻人,他们在两报相隔不远的新都大戏院前相遇,继而结伴而行,渐渐消失在步履匆忙的茫茫人海中……

这两个年轻人,一个叫赵超构,一个叫赵继纯。正是风华正茂时,均生于庚戌年,同庚兄弟。外形迥然不同,赵继纯人高马大,赵超构矮小瘦弱,人称“大赵小赵”,并称“二赵”。

赵继纯(1910—1993),原籍四川荣昌,1958年下放安徽安庆,新民老报人。早在1930年,他就参加南京《新民报》工作。当时他还是外勤记者,与老板陈铭德有同乡之谊,经常替老板跑腿。赵超

构1934年入职朝报社,任主笔兼编国际新闻,深受老板王公弢器重。

当时的南京城作为全国的政治、文化中心,大小报纸有十几家,但有一定影响力的主要有五家:两家官办报纸《中央日报》《中国日报》,三家私办的民间报,即陈铭德的《新民报》、王公弢的《朝报》和石信嘉的《新原日报》。五家报社按惯例,轮流作东,大约半月开一次聚餐会,互通信息,讨论交流办报经验。

“二赵”就是在这样的聚餐会上认识的,但他们在这种场合上交流得并不多。

据赵继纯多年后回忆,他们的“第一次交心”,是在“七七”事变以后。这一年的秋天,日本侵略军攻陷北平、天津两地,他们因等通讯社的新闻稿,编完报纸已东方破晓。但他们睡意全无,从报社出来后,在新街口一路蹒跚到赵继纯家里摆“龙门阵”,为平津沦陷“民族危亡日

甚一日的情势”而愤慨不已。

“大赵”的媳妇叫陈琴仙,又名琴先,为人贤淑,还烧得一手好菜。赵超构独自在外,经常上“大赵”家蹭饭,或小酌。有时他还带在《朝报》编副刊的同事张慧剑一道去。共同的兴趣与爱好,使这班年轻人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
1938年南京沦陷,《新民报》迁至重庆复刊,赵继纯临危受命担任总编辑。随后“三张一赵”(张恨水、张友鸾、张慧剑、赵超构)相继加盟重庆《新民报》,“大赵小赵”成为同事。

1943年夏天,赵继纯会同邓季惺、张友鸾、张慧剑等赴成都办报,并出任成都《新民报》总编辑。次年冬天,成都《新民报》增出日刊,赵继纯邀请好友赵超构,还有同事姚苏凤、方奈何、张十方等到成都助战,使日刊很快在成都站稳脚跟。赵超构的“末晚谈”,就是在成都《新民报》副刊上最先开栏的。

编者按: 今年5月4日,是我国现当代著名报人赵超构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。赵超构是我国新闻界泰斗式的人物,是中国晚报界的一面旗帜。他对如何办好社会主义晚报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,既是社会主义晚报学说的积极倡导者,也是卓有成效的践行者。本刊特刊发富晓春撰写的一篇纪念专稿,以飨读者。

赵超构(1910—1992),笔名林放,浙江省文成县人,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、著名杂文家和社会活动家。1934年开始撰写新闻评论。1944年参加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,撰有《延安一月》,客观公正地报道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真相。曾先后七次受到毛泽东接见,引为布衣之交。历任上海新民晚报社社长兼总编辑、上海市政协副主席、全国晚报工作者协会会长等。著有《延安一月》《末晚谈》《世象杂谈》《赵超构文集》等。

(二)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,赵超构继续留在上海办《新民报》晚刊,而赵继纯所在的重庆《新民报》停刊,他改行举家迁移北京到全国工商联上班。“大赵”虽然离开了新闻单位,但他与《新民报》一直保持着联系。赵超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,每年都要到北京开会,他与赵继纯,还有张友鸾、张恨水、浦熙修等其他在京的新民老报人,经常在陈铭德、邓季惺夫妇家聚会。

进入1958年,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推进,干部下放形成高潮。这年夏天,赵继纯夫妇被

下放到千里之外的安徽省安庆市任职。全家七口除了即将考大学的大闺女留在北京外,其余四个年幼的孩子,还有年迈的岳父均随他们到安庆。从北京下放到安庆的百户人家,“文革”以后,国家落实下放干部政策,有的返回北京,有的举家南迁。而赵继纯自己也没想到,他一踏上这片土地,便注定要终老一生。

赵继纯惦记着老朋友赵超构,并为他的处境而深深担忧。1970年代后期,赵继纯赴东北探亲专程绕道上海看望赵超构。当时的赵超构还没彻底“解放”,还戴着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”的帽子。他除

了上千校参加超强度的劳动外,就是将自己关在家里,“闭门思过”。赵超构没想到“大赵”这时候会来看他。对他,有些人已唯恐避之不及了。

那一个夜晚,上海市区大雾锁天,天空黑压压的像一个锅盖倒扣着。他们在虹口一个旧式石库门老房里,一瓶二锅头,就着一碟花生米,一边小酌一边彻夜长谈。

多年以后,赵继纯在一份介绍赵超构与《新民报》的材料上,谈到了那个晚上。但他没有多说什么,没有透露任何内容,他只是说赵超构的书房书很多,有专著,有线装书,满满的一屋子,称赞赵超构在那种情况下仍然不忘读书。



1989年,赵超构(中)与赵继纯夫妇同游南京玄武湖(照片由赵超构家属提供)

(三)

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“二赵”联系更加频繁了。见面或通信谈得最多的还是《新民报》过去的人与事。

1980年秋天,《新民晚报》已在筹备复刊,赵超构还在上海辞书出版社上班,担任副社长、副总编辑,政协的社会活动也多了起来。复刊筹备组整理《新民报》报史材料,其中周恩来来到陈铭德寓所会晤采编人员的具体细节,他一下子想不起来,便向远在安庆的老朋友“大赵”求助。

赵继纯记忆力惊人,据他回忆,周恩来是应铭公之邀请,在郭沫若的陪同下,秘密到重庆七星岗附近的华一村陈寓所赴宴的。铭公即陈铭德(1897—1989),四川长寿人,知名报业发行人。周恩来会晤《新民报》采编人员:一次是1942年秋,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,内战危机四伏之机;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,国民政府被迫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期间。就在《新民报》采编人员对前途感到迷茫之际,周恩来适时地来到他们中间,审时度势,指点迷津,进一步阐

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,共同商讨寻求报纸舆论宣传和反蒋斗争策略,还就《新民报》的编辑方针作出指示,使报社同仁受到了深刻教育和极大鼓舞。

这两次会晤,“二赵”均在场。赵继纯专门写了一份经过情况及周恩来讲要点的材料寄给赵超构。这就是赵超构照此史料撰写,后来收入《统战工作史料选辑》一书的《统一战线的雨露滋润了新民报》一文。

《新民晚报》筹备复刊时,赵超构约请徐铸成、张友鸾写“打炮戏”,也向老友“大赵”约稿,还赠送《新民晚报》——当年报纸发行有限,都是凭票征订的。在赵超构的鼓动下,赵继纯作为《新民报》创业的亲历者,撰写了近两万字的回忆录《抗日战争前的南京(新民报)》,后来收入“新闻丛书”《〈新民报〉春秋》(重庆出版社,1987年12月版)一书。1989年,新民晚报社举行创刊60周年纪念活动,赵继纯作为新民老报人应邀携老伴出席。赵超构会同他们赴南京故地重游,先后游览了玄武湖、中山陵、南京长江大桥等景点。

晚年的赵继纯是“林放式杂文”最忠实的读者,几乎每篇必读。1990年赵超构八十大寿,他从报上获悉,便动笔写信道贺。上海市政协、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、民盟上海市委联合召开座谈会,为赵超构八十华诞祝寿。时任上海市委书记、市长的朱镕基打电话到会场,毛经权、谢希德和谈家桢分别致辞。赵继纯在信的字里行间,表露了对“一直走在时代前沿”的赵超构的钦慕之情,称赞他“为《新民报》的发展,作出了极大的贡献”。

2015年,著名老报人张林岚谈到“大赵”时说:“赵继纯先生为人勤勉忠厚,担任重庆、成都《新民报》总编辑期间,忙于报业的发展与事务,倘若他当年留下有影响的新闻作品,那历史可能要改写,‘三张一赵’有可能就是‘三张二赵’了。”

岁月如歌,世事沧桑,每个人的生命个体总是带着某种缺憾展现于世人面前。新闻界的“大赵小赵”,虽然最终没有像“三张一赵”那样成为一种象征或符号,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值得大书特书的篇章,但他们亲如兄弟的报人情谊,却也非常同寻常而值得后人为之感叹与敬仰……